

霜王朝时期的犍陀罗地区和中国之间贸易频繁。史料记载，来自克什米尔的僧侣曾在敦煌和吐鲁番的寺庙里售卖产自贵霜的香料、地毯、宝石、木材和药材等。中国人应该在很早的时期就熟悉来自南亚的各种香料和奇珍异宝了。”

在侯杨方看来，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及至到了如今来说中亚地区的腹地。司马迁将之记录下来，譬如《史记·大宛列传》。“大宛这个国家非常重要！”侯杨方说，“‘大宛’是什么意思？‘大’与大汉、大唐、大明的‘大’是一个意思。

‘宛’就是 Yavana，古印度人称爱奥尼亚人为 Yavana，爱奥尼亚人是希腊文明的一部分，本住在雅典和小亚细亚。所以大宛就是‘伟大的爱奥尼亚’的意思。张骞接触到爱奥尼亚人的地方在费尔干纳盆地。”在侯杨方看来，张骞翻越帕米尔高原和葱岭之后，眼见的实际上是以希腊为代表的地中海文明，底层也有波斯文明。他看见了柯林斯立柱，看见了神殿、运动场、大浴场。张骞是最早喝过葡萄酒的中国人，他出使以后把葡萄带回了中国。还有“多善马、马汗血”。汉武帝知道后，就希望大宛国王给汉朝马种——不仅要马还要马种。大宛国当然不可能将这样宝贵的能大幅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战略物资拱手相送。汉军于是起码两次远征，占领了西域六国。也就是说，丝绸之路的打通，实则为了打通一条“汗血宝马之路”。

侯杨方甚至认为，秦始皇兵马俑的边上那些百戏俑、艺人的像之类，看着似乎造像者已经有一些人体解剖学的基础了，与近期从中亚、

阿富汗出土的一些雕塑似乎有相似之处。是否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国与犍陀罗地区就曾有过交流，之后一度中断，再之后由张骞出使西域又连续上了？侯杨方认为，这需要进一步研究、考证。

不过，从现在犍陀罗地区的考古发现来看，还没有找到与汉武帝同时代的佛像。目前找到的最早的犍陀罗佛像，年代大约在中国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那段时间。侯杨方分析，犍陀罗让佛具象化；佛教本身四大皆空，不留文字，只有佛祖口授，到了贵霜王朝的迦腻色伽时代，口授变笔录。其中，是否杂糅进了希腊人的哲学思想呢？

从汉唐到宋元，中国经历着王朝更替。而犍陀罗也渐渐隐入历史的尘埃。这片地方当然还有人路过。在西方人来说，马可·波罗算一个。他在写到达帕米尔高原的时候提及，“因为天气特别冷，所以火烧不旺，东西煮不熟”。侯杨方分析认为，这段话一定是那个年代有高原经历的人写的。“帕米尔高原海拔高，气压低，水的沸点也低。因此，

煮东西煮不熟。但是马可·波罗说是因为天气冷，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表述’。但假如马可·波罗行记里说煮东西煮不熟的原因是海拔高，则一定是假的——这个马可·波罗就可能是19世纪的马可·波罗。”侯杨方说道。

1908年，在白沙瓦附近的沙琪基泰里伽腻色迦大塔遗址，英国人斯普纳博士发掘出一件青铜佛舍利盒，盒上的佛像旁镌刻着希腊字母铭文“Bodda”，也由此，令犍陀罗重新为世人所知。但此后，这片土地上，经历了更多的战乱——从大英帝国对几乎整个南亚次大陆的霸占，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阿富汗人民三次抗英战争；到20世纪50年代阿富汗、巴基斯坦两国围绕“普什图斯坦”问题发生争执，直接导致苏联介入阿富汗——70年代连续发动三次政变，及至70年代末苏联出兵阿富汗；苏联解体以后，恐怖主义在一些区域盛行；此后，美国又打着反恐的旗号出兵阿富汗，并在巴基斯坦进行过多轮军事行动。

单以阿富汗为例——始建于1919年的阿富汗博物馆，曾经拥有十万件珍贵文物。但在过去一些年的战乱中，阿富汗动荡的局势给博物馆带来了几乎毁灭性的伤害。有报道披露——“阿富汗博物馆有60%的文物被窃，2000多件文物遭到了毁坏。1989年，为了使珍贵文物在动荡时局中得以保存，阿富汗政府和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制定了一个秘密计划，将博物馆中的大量文物转移至安全区域。”

近代以降的霸权主义者——英国人、美国人、苏联人，当然也包括那些极端主义恐怖分子，是否从



左图：布置了“譬若香山：犍陀罗艺术展”的故宫文华殿外景。
摄影 / 杜雨旆